

值得怀念的三年图书馆生活

谭其骧

1932年初，我结束了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学习生活，走上了我一生中第一个工作岗位，——进“国立北平图书馆”当馆员。

我的从伯父谭新嘉（志贤）先生是这个图书馆的开国元老，从民初京师图书馆时代起，一直担任着中文编目组组长的职务。由于他的推荐、请求，馆长袁同礼（守和）先生卖他的老面子，录用了我。

我一进馆就把汇编馆藏方志目录这件工作交给了我。

在我进馆以前，由于图书馆的历史关系，馆藏的方志分载于六种书目之中，六种书目的体例又互有出入，翻检至为不易。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六种书目中的方志按同一体例汇总起来，编成一部目录；并对原目进行核对，改正其疏谬或不恰当处。

这部目录的凡例，有一部分是沿用了旧目中的旧例，有一部分则出于我的新创。新创的是哪几条现在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七条：

凡省志、府志、直隶州志及领有属县之直隶厅志用黑字排印，散州及厅县用普通字排印，志有名为直隶州志而实际但志本州一邑者，亦用普通字排印，有不标直隶之名而所志兼及全郡者，亦用黑字排印。

我认为编方志目录首先应该告诉读者每一部志的记载范围有多大？是一县或相当于一县之地，还是一省、一府或相当于一

省一府之地？当然极大多数是一看书名就清楚的，但也有一些书名用的是别称而不用正式府州县名，就不容易辨别清楚是一郡（相当于一府）还是一邑（相当于一县）的志。明代有些州隶于府而领有属县，这种州的州志有的但志本州，有的兼及属县，更难从书名上予以分辨。特别是清代的直隶州，都领有属县，而这些州的州志有时书名作某某直隶州志而实际只载本州一邑之事，不及属县，有时书名并不标出直隶二字，而内容却包括属县，最使读者迷惑。所以我创立了用黑体字和普通字分别郡邑办法，使读者一看字体就知道这是一郡之志还是一邑之志。

这一条是这部目录的一个特点，我所看到过的其他任何方志目录都没有采用与此相同或类似的办法。我做到这一条是付出了相当可观的劳动的，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，因为这样做为读者带来了不少方便。

这部目录的另一个特点是凡例中的第十二条：

金石目录之学，时人所重，本编为切应此种需求起见，凡各志之有此二类者并标出之。

这是沿用了六种旧书目中某几种的旧例。我自己并不以此为然。我认为金石目录并不是方志中最重要的内容，不应该予以特殊待遇。但由于旧目的编者已为此付出了劳动，也就不便删除。既然保留了这一条，为了划一体例，就不得不把原来不采用这一条的那几种书目中的各志一一查对一下。

此外又有乡土志、乡镇志不入正目，别为附录，和不采丛书中的方志这两条，也是沿用了旧例，其实是不见得恰当的。

编方志目录最费事的是查考、确定修纂人姓名、刻板年月，辨别是创修、重修、续修还是增补，为此往往不得不把所有序跋翻遍，甚至还得翻检书的内容。我尽可能做得仔细，但诚如凡例所指出的，仍不免有疏漏舛谬之处。

我的工作进度很慢，编了一年只编了差不多一半。馆长急于要出书，决定不等我编完，从1933年5月起先把已编好的几

省付印，其余则编好一省印一省，大约到1934年下半年才全部竣工出书。收入方志以1932年底以前入藏者为限，都凡五千二百余种，其中有许多是同一书的复本，除去复本共计有三千八百余种。这就是毛边纸铅字排印本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》初编四册的编印经过。书的里封面题“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印行”，实际这是开始付印的年月而不是印成的年月。序文末行作“徐水袁同礼序”，实际上的执笔者是我。

在我离馆之后，1936年我的伯父志贤先生又把从1933年起至36年6月陆续入藏的八百六十二部方志编成《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二编》一册。由于他是中文编目组的主任，没有可能花许多时间在这上面，所以二编的体例虽然大致与初编相同，独于用字体分别郡志邑志这一条没有采用。

我的编目进度之所以慢，工作比较仔细只是一部分原因，主要原因实由于我并没有把全部时间精力放在此项工作上。这是因为我在进馆之初，即1932年初进馆后约个把星期，就开始在辅仁大学兼课；第一年上半年还只在辅仁一校开中国沿革地理一门课，后来又陆续在北大燕京二校也兼过课；除沿革地理外，又开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两段断代史，每周或四小时，或多至六小时。上两小时课就得在馆里缺勤半天，一个星期就有两到四个半天不能到馆上班。虽然我备课主要放在晚上，但有时在白天办公时间也免不了要为备课查查书。特别是到1934年，我又协助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创办“禹贡学会”，主编《禹贡》半月刊，馆外的任务越多，馆内的工作当然更要受影响。我身为图书馆馆员，放在编目或其他为图书馆做的工作上的时间，大概最多三分之二，有时可能只有一半。我这种情况袁馆长当然是很不以为然的，但又不便下令阻止或公开批评。我自己心中有数，所以一等到《方志目录》编成，1935年春节一过，我赶紧提出辞呈；袁馆长随即欣然接受了我的辞呈。

我在北平图书馆整整呆了三年，编《方志目录》之外虽然

也零零碎碎打了些杂，如在馆里开展览会时起草一些介绍和说明，偶然也为袁馆长代笔写点应酬文字等，总的说来实在没有做多少事。至于为馆办的《图书季刊》、《大公报·图书副刊》写稿子，那是有稿费可拿的。

我没有为北平图书馆做多少事，北平图书馆却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。我之所以懂得一点学问的路子，在结束研究生生活后紧接着又在图书馆里呆上这三年，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。

我的办公桌摆在主楼楼下东首向南的那一间里（楼下地下室是舆图部），在这间屋里工作的只有我和我的助手两个人，很安静。但我一天平均得翻上五六至七八部方志，都要从书库里借出搬到办公室里来翻阅是太费事了，所以我在办公桌上工作的时间少，大部分时间干脆就在书库里的书架前面摆一张小桌子工作。可是我虽然为了查方志而进书库，进了书库，却往往并不限于翻方志了，而是东翻翻，西翻翻，只要看到书名觉得值得翻一翻的我都翻。这样长期翻阅的结果尽管所得的知识是很肤浅的，但毕竟是大大扩充了我的知识面。

那时的北平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专司采购、编目、庋藏、借阅图书的机构，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。除了各部的主任、馆员之外，还特设编纂委员一职，网罗了向达（觉明）、贺昌群（藏云）、刘节（子植）、王庸（以中）、谢国桢（刚主）、赵万里（斐云）孙楷第（子书）、王重民（有三）等一批中年学者在馆从事与图书整理有关的研究工作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可以说是俊彦萃集，极一时之盛。这几位先生年龄都要比我大十岁左右，早就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，我以一个后辈的身份和他们亦师亦友地相与游处，关系远比在大学里的同事密切，因此我得到这几位前辈再加上同年辈的萧璋（仲圭）张秀民（涤澹）等同事的熏陶切磋之益，也有过于后来单纯在大学里教书的年代。

那时我还没有结婚，单身住在景山西门陟山门大街图书馆办的宿舍里，但住在这个宿舍里的却并不一定是馆里的职员，只要是文化界中人，通过介绍，都可以住进来。因而我在宿舍里又结识了女子文理学院教师谢兴尧（五知）、翻译工作者刘国平等几位朋友。我和馆里和宿舍里的同事和朋友除谈论学术外，还经常一起逛旧书铺，一起上小馆子，有时一起看京戏。这三年的图书馆生活，确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。

1982年6月26日

《史学史研究》（季刊）

——征求1983年度订户启事

《史学史研究》（季刊）是国内唯一的史学史专业刊物，创刊于1961年，原名《中国史学史资料》、《史学史资料》，从1981年起，改用现名，由白寿彝教授主编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辑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史学史研究》的主要内容有：研究史学遗产问题、历史教育和教学问题、历史学科建设问题，评论近代史学流派、史学书刊和古今历史家的成就，读史札记，报道多卷本《中国通史》编撰动态等。一向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，实为历史专业工作者、大专学校历史系科师生、中学历史教师及业余史学爱好者的优良读物。

《史学史研究》已开始征求1983年度订户。订阅者请开列收件人姓名、住址，订阅的期数和份数，将订费寄交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（因出版社发行科业务较忙，暂由本所代办）。订费每期0.45元，全年1.80元，邮费在内，开户银行：北京 中国人民银行新街口分理处，帐号：8901187（请勿在信封中夹寄邮票作为订费，以免遗失）。